

第三章

西藏的社会变革与人权 状况的根本改善

张江华

1959年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封建农奴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昔日农奴人权状况较之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获得了根本的改善:他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良好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经济大见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这些变化,却遭到达赖集团及其外国支持者的否定和攻击。作为旧西藏农奴制度的代表者达赖集团,他们并不认为废除农奴制度、让封建领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是合理的。那么这个封建农奴制度是否应该废除?废除了这一制度后,西藏人民是获得了人权或人权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是失去了人权?是获得了幸福,还是失去了幸福?这是两种人权观争论的焦点。因此,把以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西藏社会变革,置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衡量是非曲直,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对西藏社会的两种人权观

要研究西藏的社会变革,必须先从旧西藏的社会性质入手。

对 1959 年民主改革前，特别是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的社会性质，持不同立场的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人权观。

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对旧西藏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的观点，是站在封建领主阶级立场上的观点。他们说：“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①“在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奴制度”。^②达赖本人则说：西藏“尽管过去在物质上很落后，和今天在中国人占领下的情况比，人民还是幸福得多”。^③“古老的西藏社会虽然在物质上很落后，却是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1959 年以后的 20 年，西藏“是在黑暗中度过的”。^④他们认为，“1950 年以前……那里的居民尽管处在艰难之中，但普遍都幸福和充满微笑。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一个人的心灵中会有抱怨，每个人的要求都会得到社会的关注，所有的人在一個无阶级的天堂里被仁慈地统治着。她是一个‘香格里拉’”。^⑤概括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们的上述言论，就是认为旧西藏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民快乐幸福的世外桃源。他们承认旧西藏物质上落后，但不承认旧西藏存在过农奴制度。民主改革后的西藏

① “西藏外交局”1949 年 11 月 2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

② 转引自〔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217 页。

③ 维杰依·克兰蒂：《转世传承的结束》，载 1978 年 6 月 9 日《远东经济评论》，达赖喇嘛情报处编入《达赖喇嘛声明、文章及谈话选编》。本文引自翟胜德汉文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打印。

④ 《达赖喇嘛直言不讳谈论与北京的接触》，载 1982 年 6 月 16 日《远东经济评论》。引处同上。

⑤ 转引自〔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导言第 2 页。

倒是“黑暗的”。按照他们对西藏的这种描述，旧西藏这样一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的美妙地方，合乎逻辑地应该保留、存在。凡是一切对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批评、否定（废除），就是“侵犯人权”，从而构成达赖集团否定民主改革、鼓吹“西藏独立”的理论根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旧西藏是一个落后、黑暗、残酷、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极苦的社会；是一个以教驭政、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社会性质的这个科学结论，是经过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科学的结论。早在1951年李有义教授撰著出版的《今日的西藏》一书中，就根据他于1944—1948年在西藏工作期间搜集的丰富资料，介绍西藏官家、寺庙和世家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的社会面貌，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封建性质。同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建了西藏文化工作队，其中由民族学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任组长的社会历史组，有多杰才旦（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总干事长）、宋蜀华等多人跟随人民解放军一同进藏，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搜集了有关西藏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1954—1955年林耀华、李有义、宋蜀华、王恩庆、王辅仁分工执笔，撰写了《西藏社会概况》。书中有关西藏经济的一章中，对旧西藏社会论述道：“西藏社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带有奴隶社会残余的封建经济。就土地关系来说，西藏同样有两个阶级：一是拥有土地而不劳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一是没有土地而只劳动的农奴阶级”，有“三种封建地主”，“即地方政府、世家和寺院”，“它的经济状况是很落后的……基本上是以庄园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经济”。这些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西藏社会性质的最早的研究成果。1956年，为将正在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记录下

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又在全国组织了 8 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8 年增至 16 个），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为其中之一。以这个调查组为核心，众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在藏工作的有关部门的干部，其中包括许多藏族干部，先后参加了长时间的、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数百万字的材料，他们一致认为，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度。他们还配合摄影和电影工作者记录了许多从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的反映西藏当时的真实照片和镜头。1959 年 4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汪锋调阅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西藏党政军各方面干部调查的基本情况材料，以他深厚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的功底，对包括旧西藏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借鉴了众人的研究成果，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第 16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总结了对旧西藏社会性质结论性的看法：“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① 从此，旧西藏是“封建农奴社会”这一结论，在各方面的人士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在国外，也有不少学者与中国学者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封建一词是对 1950 年以前西藏社会最好的描述……西藏和中世纪的欧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藏是一个具有封建社会结构和没有工业经济的不发达地方”。^② 综合不同方面人士对旧西藏社会的研

① 毛主席在第 16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 4 月 15 日），载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1 页。

② 参见〔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77 页。

究成果，可以看到旧西藏属于封建社会范畴，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史载，西藏在吐蕃时期就“用刑严酷”，翻阅近代一些外国探险家、旅行家游历西藏后的记录，可知这种严酷的刑罚仍然存在。在他们眼中，旧西藏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旧西藏的“故事”是“离奇、凄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神王”统治的地方充斥着剜目、刖膝、割舌、剥肢、投崖、屠杀等残酷的刑罚。^① 据调查，在琼结县城内的古堡钦哇达孜宫废墟上，过去曾修有宗政府的房屋，其底层就有一阴湿的监狱。早期有木质锁枷、脚枷、石帽和皮鞭，对犯人鞭打、监禁、流放、投蝎子洞等。虽然旧西藏存在的酷刑是施之于被西藏地方政府认定为“犯人”的，这些受刑人肯定也不会是多数，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汉族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类似的酷刑，但酷刑的存在说明社会制度的落后。决不可能与“仁慈”和“进步”联系在一起。总之，我们在旧西藏只能看到一幅社会落后、人民处境悲惨的图景。达赖集团及其同情者宣称的旧西藏是“幸福的”社会，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是不存在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旧西藏绝不是什么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而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存在着奴役制度和落后现象的地方。

第二节 旧西藏是中世纪 社会的延续

许多中外学者在论著和文章中把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

^① 参见〔英〕彼得·霍普柯克著、向红箭译：《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6页。

比之为欧洲中世纪社会，这是相当形象和符合实际的类比。中世纪，原指欧洲的封建社会，介于古代奴隶制与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以神权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特权相结合为其政治特征，以宗教神学为思想意识形态。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吐蕃奴隶制政权崩溃后逐步形成的，它是古代中国自元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延续，只不过具有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的特点而已。它的人权基本状况是以寺院、政府和贵族垄断着政权、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对农奴人身的部分占有权和农奴的完全无权为特征。

这是一个财产占有不均，生产资料集中在封建领主手中的社会。西藏和平解放前有人口 105 万，其中农业人口约在 55 万以上，牧业人口约在 25 万以上，僧尼 12 万，城市贵族和商人约 3 万。共有耕地约 337 万克（亩），^① 其中包括轮休地 56 万克。农业人口平均占有常耕地 5.1 克，年产量粮食 3 亿斤左右，平均克（播种面积，约相当于亩）产 4 克（容量单位，约为青稞 14 公斤），即平均克产为播种量的 4 倍，人均粮食不足 300 斤。牲畜约 890 万头（只），牧区约 600 万头（只），牧业人口人均 24 头（只），农村人口人均 4.4 头（只）。可见旧西藏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产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社会。也是不事生产的、依附于农牧业人口的僧尼数比例极大的社会。这些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均衡地分配在所有居民家中，而几乎全部土地和人部分牲畜都被西藏人口不到 2% 的封建领主所占有。例如，官家约占有总耕地面积的 38.9%，他们的庄园称为“雄谿”；寺院

^① 此据 1959 年 11 月 3 日《中共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记载。分项的人口总数之和与总数不符，估计农、牧业人口不只此数。另据 1993 年《西藏统计年鉴》载，1952 年末西藏人口为 115 万。

约占有总耕地面积的 36.8%，他们的庄园称作“曲谿”；贵族占有总耕地面积的 24%，他们的庄园称作“格谿”。他们占去了全部的耕地和相当大一部分牲畜。

旧西藏也是一个阶级和等级界限十分森严的社会。封建领主和农（牧）奴是两大阶级，封建领主包括官府、寺院和贵族三个方面。这三种领主中，官府和寺院属集团性领主，一个是政权机关及其从上到下的统治系统，一个是大大小小的寺院和有封地的活佛拉章。组成这两个领主集团的成员，很多来自贵族家庭，这三大领主互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依靠，互相利用。三大领主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领主阶级的主体，其中包括贵族、土司、上层喇嘛和官员。旧西藏有大小贵族 642 家，其中最大的 25 家。据 1959 年公布的材料，整个领主阶级人数占总人口不到 5%，其中领主占不到 2%，另有约 3% 的是与领主关系密切，为领主阶级利益服务代表领主、管理农奴的管家、谿堆（庄园管理官员）、佐扎（乡间小吏）和少数大差巴等民主改革时划定的领主代理人，也属于领主阶级的范畴。农奴阶级在总人口中约占 90%，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在承担领主租税的前提下，从领主那里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西藏局部地区亦有少部分类似自耕农的农奴，他们需要向噶厦政府负担租税和徭役。还有约 5% 地位近似于奴隶地位的人，他们多在领主庄园中从事家务劳动和部分农田劳动。

三大领主权力的分配从本质上说，是由财产的多少来分配的。当然官府和寺院作为集团性领主，其权力的大小与他们分别执掌政、教权力也有密切的关系，财产确定了他们的权力，而权力又使他们获取更多的财产。在拉萨的哲蚌、色拉和噶丹三大寺，拥有谿卡 320 个，牧场 450 处，耕地 14 万多克，牲畜 11 万头，属于他们的农奴 6 万多（他们的属寺不计在内）。教权的力

量和雄厚的财产实力，使三大寺成为可以左右西藏政教局势的力量。至于世俗贵族，他们的地位完全是由财产的多少决定的。农奴是不可能成为官员的。达赖、班禅或其他一些活佛中，也有选自非贵族家庭的，从形式上看这是对财产决定权力大小的一个例外。实际上，他们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教势力左右着。一旦成为活佛，其本人和家属就跻身于贵族行列。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构成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在卫藏地区实行庄园制，一个领主集团或一家贵族，至少有一个、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庄园，分布于广大农区。庄园制土地的经营是将土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即差地），自营地是庄园直接经营的土地，劳动力由领种份地的农奴用劳役地租的形式去为领主耕种。承担劳役地租是获得份地的前提。领主的自营地和农奴的份地在经营的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开的。为防止农奴在领主的自营地里劳动时消极怠工，常有庄园涅巴（管家）指派的监工用皮鞭监督农奴劳动。份地的经营则靠农奴家庭自行安排，以不影响领主自营地的劳动为前提。有些时候因抢农时，农奴家庭劳动力不足，农奴“自己的”地的经营不时受到影响。对家内奴隶则无份地可言，他们的一切劳动都在工头的监督下进行。在昌都、墨脱、阿里和亚东等地，有非庄园制的租佃式经营方式。农奴租种领主的土地，由农奴自己经营，为领主负担徭役和缴纳租税，有的地区农奴还要交不同数量的货币。从而形成西藏封建农奴制租税制度中以徭役为主，实物次之，货币再次之的混合地租的特点。三种地租综合折算，农奴的负担量占整个劳动时间或创造的总财富量的40%至70%不等，如扎囊县囊色林谿卡其剥削量占农奴总收入的73%。^①

①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39页。

按照旧西藏常耕地面积、平均单产和人口统计估算，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计算，每人每天平均不足半公斤粮食。^①以整个社会的需求看，从理论上讲，粮食总量对 105 万人的生存是不够的。而社会的分配又是不公平的，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到封建领主手中。农奴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达不到平均有粮标准。领主将粮食囤积，如日喀则的夏鲁寺，民主改革时，囤积的青稞和小麦多达 1.8 万余克。^② 如此，则社会上的粮食必然缺乏，一部分农奴必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那时大部分农奴只种份地是不够维持生活的，许多家庭还要去领主家打零工，以获得份地以外的收入补给家用。有的则向领主借粮，春借秋还，多实行“借 4 还 5”或“借 5 还 6”，借期约半年，利息高达 20% 以上，许多农奴是借了还，还了借，陷入高利贷的盘剥之中。有的地方欠债户达 70%。领主为了更多地掠夺农奴财富和控制农奴，他们也把放高利贷作为剥削农奴的一个重要手段。达赖的后勤管理机构中，就设有专管放债的机构，噶厦的粮务局、大昭寺的财库、布达拉宫等处都在放债。据民主改革时统计，拉萨三大寺向农奴贷粮 1623273 克，每年收取利息 285692 克，年利率为 17.6%，这是年年收取利息不让还本的利率，短期所借债务利率就不只此数了。有的领主还采取强迫措施，将债务分配下去，强迫农奴借贷。许多农奴欠下“子孙债”、“万年债”，永远还不清。由于领主与农奴生产资料占有的极不平均，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而失去了领主与农奴人权平等的前提。

① $4 \text{ 克 (克产)} \times 300 \text{ 万 (克, 常耕地)} \times 14 \text{ (公斤, 1 克折合)} \div 105 \text{ 万 (人口)} \div 365 \text{ (天)} = 0.44 \text{ 公斤}。$

② 徐庆春：《忆夏鲁寺的民主改革》，载《西藏革命回忆录》，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1、167 页。

领主和农奴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领主部分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依附于领主的关系，且世代不能变更。农奴在政治上无权，社会上也没有他们的独立人格。他们虽然与奴隶社会里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的地位不同，有了“人”的地位，但还不是自由的人。这种受领主约束的身份，是普遍性的；形成“人不无主”，“地不无差”的局面。领主可以把属于自己的农奴连同庄园和土地一起与他人交换、出卖、转让、赠送、陪嫁甚至赌博。领主还操纵着农奴的婚嫁大权，不同属主的农奴之间的婚嫁要由双方主人交涉，或交换农奴，或一方农奴向自己的属主交赎身费，或农奴夫妻双方各自的属主不变，各服其主，所生子女，依性别各归父母所属领主。因各种原因离开领主外出谋生的农奴，包括乞讨者，领主也要他们每年交人役税，以示其对农奴的领属关系。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人身部分占有，是农奴制度的一个典型特点。如果按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天赋人权”观点，农奴应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而农奴的人权被领主阶级所剥夺，领主阶级的成员则可说享受了“超人权”，这种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不平等性正是早期人权主义者所针对斗争的主要目标。

旧西藏是政治特权与教权（神权）相结合的社会。旧西藏的政权结构是以宗教与政治合一的方式组成的，宗教权力高于一切。宗教领袖之一达赖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在达赖统治之下，有管理宗教和行政两个系统。各级宗教系统由上层喇嘛任职，就是在世袭的行政权力方面，也是由上层喇嘛把持各级政权的重要职位。噶厦中的4个噶伦，1僧3俗。各宗的宗本，是1僧1俗，一般以僧宗本为右。从官员总数看，僧官为多，据原西藏地方政府每年一次的官员例行排名登记，1959年初有各级官员477人，其中僧官266人，

俗官 211 人。^① 可见旧西藏的政治实际上是教权政治。少数大寺院已不完全是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设有监狱、宗教法庭、刑具和武装的政治色彩极浓的集团。

旧西藏并无现代意义的法律，但是它有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所制定的律例。这些律例中严格规定了不同阶级和不同等级的贵贱区别，以及体现领主阶级意志和价值观念的内容，所具有的封建性质十分鲜明，同时也带有佛教思想影响，宗教色彩浓厚。十四世纪中叶，在帕木竹巴政权时期，执政者绛曲坚赞，集吐蕃以来历代诸法之大成，制定了“十五法”；17 世纪初，藏巴汗政权时期，执政者丹迥旺布在“十五法”的基础上增加条目成“十六法”；17 世纪中，五世达赖时期又有对前述法律的删改而成的“十三法”。在三个法中，都有“杀人命价律”一条，其中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杀人者可以用财产赔偿人命，而不必采取血族复仇的方式。人的等级不同，命价也就有天渊之别：“上部雅孜王被霍尔所杀，尸价与黄金等量，下部格萨尔被丹玛行刺，至今命价尚未偿清”，这一规定虽然包含的是宗教与民间传说的内容，但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其实质是指世俗社会里被神化了的“王”的身份的人，如达赖一类的人物，他们的命价或是与尸体等重的黄金；或是与“无价之宝”等贵，所以命价才永远偿不清。而“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在《盗窃追赔律》中规定：“凡盗窃王、官员、头人之财物须罚赔原物之万倍，偷寺院僧人财物须罚赔 80 倍，偷与自己同等地位人之财物须罚赔 7 倍至 8 倍或 8 倍至 9 倍不等”。在《伤人抵罪律》中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者手足。主仆之间，主失手伤仆，除治伤不再判

^① 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前言第 1 页。

罪，主毆仆致伤无赔偿之说”。^① 从这些法律的规定可以充分看出，旧西藏各阶级社会地位的高低除了经济地位决定外，也与职位高低、职业差别和出身血统有联系。上等级别的都是上层统治阶级，他们掌握着封建政权和宗教权力，享有特权。封建法律把他们的血统划为“高贵的”，成为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的上层部分。达赖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治权力最大，它有权分封庄园和农奴给寺院和贵族，也有权收回庄园和农奴。当然噶厦的这种权力，它的大的决策，又受宗教势力的影响，成为寺院集团的代言人。广大农奴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却处于社会的下层。他们受制于上层特权享有者，无人权可言。这种由封建农奴制的法律规定的“命价”反映的等级贵贱高低的差别，与《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宣示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是完全背离的。

在旧西藏，闭塞、落后的封建社会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宗教观念使人们离开了现实，人们并不知道“人权”这一概念。他们在宿命论的思想束缚下，被迫接受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大农奴不愿意去追求和向往过平等、幸福的生活。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在现实社会中怎样去追求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自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觉悟。因此，他们只得在宗教的说教中去寻找安慰，去追慕来世的平等幸福，因而藏传佛教几乎为全民所信仰。以为做到了敬信三宝、虔心事佛以后，自己也就如教义所宣扬的逝后可以成“佛”，进入佛国的“极乐世界”去享受平等、幸福的生活了，而现实的人权却被忽视。领主阶级的成员，他们一般也虔信宗教，他们手中的各种权力被解释成是佛赐予的，而农奴们的无权地位也是佛安排的。有权的就向无权的宣传：你们

^① 参见周润年：《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安于现状吧，到“来世”去享受平等！因此，今生忍受痛苦，寄希望于“来世”的思想在不自知不自觉中被农奴所接受。活佛以“佛”在世俗社会里的代言人、执行者的面目出现，再加之自元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和对宗教头人的封赠，更加强了他们的地位。由“佛”和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更显得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广大农奴和奴隶做人的权利被剥夺净光，而宗教只给了广大农奴以“来世”虚幻的平等、幸福和人权。

第三节 废除农奴制合乎世界 进步潮流

我们在讨论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否应该废除的时候，还应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17世纪开始，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和民族中，封建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所取代。20世纪初期，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也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作为中国清王朝一统天下的一部分边疆区域的西藏，其封建农奴制度本应随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一并被废除，但是由于领导民主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对封建很不彻底，内地省份尚难有力控制，边疆地区更无暇顾及了。因而出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的局面：内地快而边疆地区慢，汉族聚居区快而少数民族聚居区慢，甚至如西藏这样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民主革命。同时由于西藏人民居住环境极其闭塞，又在宗教思想的控制下，多数人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和世界的发展潮流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因而西藏本身还缺乏产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土壤。从辛亥革命直至蒋介石统治时期，历届政府的封建性，决定

了他们不可能去触动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军长征因为只在通过的西藏东部毗邻地区有过一定的革命活动，对西藏影响甚微。全国解放前夕到西藏和平解放，革命洪流才对西藏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即使如此，由于封建的政教势力根深蒂固，广大农奴的思想觉悟也需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直至1959年，特别是和平解放前，封建农奴制度还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广大农奴的人权状况亟待改善。

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很难想象，一种落后的奴役制度到了20世纪中期还允许其存在下去。据不完全统计，现代的世界人权保障文书已有100多个，^① 在世界性人权约法、区域性人权约法和具体人权约法中，都有涉及人身权利、废除奴隶制和与奴隶制相类似的社会制度的宣言、公约和宪章多个。国际人权约法中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规定，也足以说明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还存在奴隶制度的实际，国际联盟主持制定了《禁奴公约》^②（1926），公约在前言和正文条款中对奴隶制进行了界定，并规定禁止对奴隶的强迫劳动和奴隶贩卖行为，其部分条文如下：

“完全消灭一切形式的奴隶制”；

“制止强迫劳动产生与奴隶制相类似的状况”；

“奴隶制为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的地位或状况”；

^① 据董云虎等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5编目录统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② 同上书，第1102页。

“奴隶贩卖包括在使一人沦为奴隶的一切掳获、取得或转卖的行为；一切以出卖或交换为目的而取得奴隶的行为；将以出卖或交换为目的而取得的奴隶通过出卖或交换的一切转让行为”。

到本世纪中期，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①此后，联合国又根据已有之废奴公约进行了补充，使原有的专项公约更加具体和全面。这就是《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1956)，其中还对“农奴制”专门作了界定，指出它是与奴隶制相类似的奴役制度，属废除之列。公约引述联合国大会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任何人不得使充奴隶或奴役，奴隶制及奴隶贩卖，不论出于何种方式悉应禁止”；

公约又指出：“惟深知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尚未在世界各地完全废除”；

“爰决定缔结补充公约，俾增益现仍有效之 1926 年公约，借以加强国内及国际方面谋求废止奴隶制、贩卖奴隶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之努力”；

《公约》在其第一编中规定：

“本公约各当事国遇有下列制度与习俗依然存在之情形……均应采取一切实际而必要之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渐并尽速达成完全之废止或废弃”：

“（甲）债务质役……”

“（乙）农奴制，即土地承担人受法律、习惯或契约之拘束须

^① 据董云虎等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 5 编目录统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961 页。

在他人所有之土地居住及劳作，并向该一他人提供有偿或无偿之若干固定劳务，而不能自由变更其身份之状况”；

“(丙)……受金钱或实物之报酬，将女子许配或出嫁，而女子本人无权拒绝”；

“(丁)儿童或未满18岁少年……交给他人以供利用，或剥削其劳力之制度与习俗”。^①

以上是世界性的有关废除奴隶制、农奴制的主要条款。除此之外，一些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都有对本区域禁止奴隶制度、买卖奴隶和禁止拷打及残忍刑罚的条文。^②

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时是那样相似。在世界历史中，也不难发现废除奴役制度，解放奴隶的斗争历史。仅以美国为例，美国于1776年宣布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统治下独立，北方先后废除了奴役制度，而南方还盛行着种植园主的奴隶制度。人身奴役制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损害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北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南方奴隶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林肯任总统后，主张国家统一，逐步废除对黑人的奴役制度。1861年，南方各州奴隶主反对废除奴隶制度，发动了针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的武装叛乱，宣布“独立”。

① 董云虎等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分别见第1107、1108页。

② 区域性人权公约涉及废除奴隶制度的有：1950年11月4日定于罗马的《欧洲人权公约》第四条：“任何人不得被蓄为奴或受到奴役”。1969年11月22日定于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的《美洲人权公约》第六条：“任何人不得受奴役或从事非自愿的劳役，各种形式的奴役和劳役正如奴隶交易和贩卖妇女一样都应予禁止”。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五条：“对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侮辱，尤其是奴隶制度，奴隶买卖、拷打及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污辱性的刑罚和待遇，均应予禁止”。

于是联邦政府开始了对南方的征战，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1862年颁布了土地改革制度《宅地法》：凡年满21岁美国公民，包括愿入美国籍的外国人，每人可分得160亩土地，耕5年后归耕者所有。当年9月，林肯又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叛乱各州被奴隶主占有的黑奴为自由人，并在1865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获得自由的黑人积极支持联邦政府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经过5年的征战，联邦政府获得了胜利。

用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看我国废除西藏农奴制度，难道没有一种共同的合理性吗！诚如一位美国公民的认识：“美国解放黑奴是尊重人权的表现，为什么解放西藏农奴却是‘反人权’呢？美国南方诸州的农奴主反对解放黑奴纷纷宣布独立，林肯总统以军事行动粉碎他们的‘独立’是正义行为，何以西藏少数人闹‘独立’却又被人赞赏呢？……要在实际上去坚持同一正义、真理、法制，岂能对此一个准则，对彼一个准则？”^①从世界、地区和一个国家涉及到的废除奴役制进行的流血斗争可以看出，废除一切奴役制度，不管是奴隶制、农奴制和殖民主义者占领殖民地后形成的奴役制度，都是为争取人类的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用这种观点看待西藏农奴制度被废除，其争取广大农奴和奴隶的人权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自己的领土西藏对尚存的封建农奴制度实施社会变革，进行这种变革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早已完成，完全合乎世界进步的潮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基本人权，促进西藏社会进步、繁

^① [美] 宗鹰：《“台独”随谈》，载香港《镜报》1992年第3期，第77页。

荣，步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四节 社会改革使西藏 人民获得人权

旧西藏的社会必须改革，这是为广大农奴争人权、求民主的正义举动，这个主张合潮流，顺民意。当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已完成多年，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丰富的领导经验，在此基础上考虑西藏的社会改革，必然借鉴内地的经验，并结合西藏的特殊性，制定出适合西藏特点的政策。作为领主阶级，有如汉族地区的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领主阶级中的每一个具体成员，如果不是罪大恶极者，应该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领主中的一些有社会影响和有工作能力的进步分子，政治上给予安排，参加工作，成为领薪金的国家干部。过去无权的农奴，有如汉族地区的贫下中农，应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翻身，得到做人的基本权利，成为自由农民，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改革，因西藏宗教、民族的特殊性，西藏上层在群众中还有较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因此要等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觉悟。所以在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致敬代表团时又说：

“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替你们分”。^①从协议签订至1959年初，在西藏工作的干部都在做这种等待工作：团结上层，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团结工作。对群众作一些影响工作：如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免费医疗，扶助生产，救济贫困，开办学校等。对反动领主迫害参加工作的农奴的政治事件，从制度上进行了抵制。1956年前后还对西藏上层人士作了安置工作。这些行动受到了大多数上层人士和藏族人民的拥护，当时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干部被誉为“菩萨兵”、“新汉人”。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成立。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带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机构的建立，必然是对封建领主政权噶厦权力的削弱，这就使西藏多数人在获得人权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为建立正式的西藏自治区作了准备。中央的意图是创造条件通过和平方式逐步取代封建的农奴制地方政权，在经济制度上进行和平改革，即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获得多数人的人权。这个条件就是等待西藏上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的觉悟。正如陈毅副总理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改变西藏落后的面貌，“不可避免地要在内部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中央对于西藏民族内部的改革，一向主张要根据本民族的志愿来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进行，而绝对不能由别的民族去代替进行。”^②由此可见，中央对西藏的改革采取的是循序渐进、力求稳妥，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方针，这是符合西藏实

^① 《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和材料选编》，新华通讯社编印，1959年6月。

^② 同上书，第169页。

际的。

筹委会成立不久，党中央针对西藏工委在工作中的急躁情绪，于1956年9月4日发出指示要求“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一定要对西藏上层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进行。”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明确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去”，“在民主改革问题上，我们已经等待好几年了，现在还必须等待。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①从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对西藏的改革采取了等、让、慢、稳的正确方针。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1月29日、12月30日、1957年1月1日三次与达赖谈话中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了六年不改的方针。这种推迟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对这一方针周总理在1957年8月4日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更全面的阐述：“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指出：“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

^① 《当代中国的西藏》，第266页；《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7页。

制度……改革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改革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①

问题十分清楚，在改革问题上中央与西藏上层顽固势力的分歧不是早改或是晚改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西藏上层中的顽固势力企图永远不改，他们知道：改革早晚是要进行的，领主阶级一定要被消灭，他们个人的领主身份一定要被改造。他们并不满足于和平改革后中央对他们政治上的安排和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许诺，不愿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当然也不愿意多数人获得人权。他们把中央的等待、让步和克制看成是害怕，甚至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反对中央言行越激烈，中央就越是让步，中央是软弱可欺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地显现，局部叛乱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叛乱分子们只是寻找借口的问题了。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借口反对达赖要去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一事，大肆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公然在拉萨发动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武装叛乱，狂呼“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狂妄宣布“西藏独立”。3月17日达赖一行逃离拉萨。3月18日凌晨，叛乱武装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所有部队、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反击，很快平息了拉萨的叛乱，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政权。3月28日总理周恩来发布了国务院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下令“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在中央这一重大决策指引下，西藏的平叛斗争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由于反对改革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被平定，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社会制度的障碍已经被清除，中央原来规定的六年

^①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不改的政策自然也就不能再继续下去。4月2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①在此前后，中央驻藏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在平息叛乱斗争中积极发动群众；一方面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制订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讨论和协商，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指出：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民主改革正式开始的标志，决议根据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实现民主改革应当分两步：首先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和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为下一步分配土地打下基础。”^②西藏的民主改革在农区、牧区和寺院中是按不同情况有区别地进行的。在农区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宣布废除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封建乌拉差役制度和高利贷剥削；废除农牧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废除1958年以前三大领主贷放给劳动人民的一切债务，对1958年的债务实行减息。第二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除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外，对未叛领主的生产资料参照内地改造资本家的办法实行赎买。对此，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4月15日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有具体指示：“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

① 《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载新华通讯社编：《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和材料选编》，第1页。

② 《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见《西藏人权保障文献汇编》。

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① 根据这一精神，在改革的文件中具体规定了对未参叛贵族、寺院和领主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农具、耕畜、房屋、实行赎买。在牧区因牧业生产的特点，实行“三反两利”政策：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对叛乱牧主的牲畜宣布“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未叛领主的牲畜仍归本人所有，以稳定牧区的生产秩序。寺院又有其具体情况，实行“三反三算”：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阶级压迫账和经济剥削账。

此后在民主改革开始后又根据决议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文件。首先是在三反双减的基础上，为适应民主改革第二步土地改革的需要，参照内地的土地改革政策，于9月制定了《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将农村人口基本上划分为农奴主、农奴两大阶级，另外同时还存在着奴隶社会残留下来的奴隶。农奴主阶级指各类领主和他们的代理人，约占总人口的5%；农奴阶级又分富裕农奴、中等农奴和贫苦农奴，前者相当于大差巴，后者基本上是中、小差巴、堆穷，约占总人口的90%；奴隶，相当于朗生，约占人口总数的5%。它的特点是依据西藏的特点，不划富农。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对牧区不划阶级，依靠劳动牧民，团结

^① 毛主席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载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牧主。在寺院首先区分叛与未叛，对其生产资料分别实行没收和赎买。在僧众中不划阶级，每个喇嘛的阶级成分由其家庭而定。依靠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寺院领主和农奴主代理人。

1959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广大农奴个体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奴对土地的要求，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其他生产资料和赎买未叛领主的多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所有；废除一切封建特权，人身奴役和依附关系，解放农奴和奴隶成为自由农民。阶级的划分和土改的完成使西藏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组成新的社会结构的各阶级和阶层所有公民应有的权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规依法予以保护，被誉为“翻身农奴”的新西藏的自由农牧民的社会地位，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农民协会是土地改革的执行机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由农民协会进行，党和政府派去的工作组帮助和指导农民协会工作。土地以乡为单位计算人均基数，然后以村为单位，抽多补少，好、坏、远、近搭配，尽可能满足贫苦农奴和奴隶对土地的要求。1960年冬，凡已经进行土地改革并进行了复查的地区，颁发了土地证，确认翻身农奴和其他依法分到土地的人员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从法律上完成土地改革的最后一项工作。至1961年初，全西藏20万户约80万过去无地、少地的农奴，获得了280多万克土地。对未叛领主多余生产资料的赎买政策也得到了落实，到1961年2月，全西藏有1300户赎买对象办了手续。

民主改革的完成，使西藏的人权状况获得了根本的改善，广大农牧民破天荒地从封建领主阶级的奴役和束缚下得到解放，他

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获得了较农奴社会好得多的物质生活。民主改革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藏社会的这一变革，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巨大飞越，一个还停留在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被永远地废除，为西藏社会的继续发展扫清了障碍。事实证明，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必要的、正确的。